

现代汉语移用语素和移植语素的意义生成与演化

——兼谈辞书编纂的词汇学原则与词典学原则

刘伟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摘要:单音节移用语素随着方言词的意义移用而来,依靠词汇降格直接生成;其意义的演化(由A义到B义)主要在句法层面实现;根据意义来源的地域是否相同,意义之间呈现出派生关系和非派生关系。单音节移植语素的意义生成,少部分是单音节音译外来词依靠词汇降格直接实现,大部分则需要通过多音节外来词音译成分的语素化,其最初的意义是某个音译成分跨层移植了外来词的意义,进而在造词活动中生成的;其意义的演化有的在词法层面实现,有的则在句法层面实现,意义之间呈现出派生关系。语文辞书在词条分合处理上不仅坚持词汇学原则,有时也兼顾词典学原则,因此,单音节移用语素和移植语素的意义演化研究应该剔除意义来源不同且不具有派生关系的类型。

关键词:语言接触;方言词;外来词;语素义;生成;演化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3-0010-08

苏金智认为:“语言接触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语的、有同源关系还是没有同源关系的,在一种特别的语言环境中被语言使用者交替使用。”^[1]因此,不仅存在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而且汉民族共同语与地域方言之间也有接触。现代汉语中,有的外来词和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之后,由于使用范围扩大,使用频率较高,对汉语原有的词汇系统、词义(语素义)系统造成了一定影响,学者们对此多有关注,如孙银新^{[2]180-112}、苏新春^[3]、刘晓梅^[4]、李志佳^[5]、刘伟^[6-7]、孙道功^[8]等。但从词义对语素义的影响层面来看,作为方言词和外来词的构词成分,现代汉语中的移用语素和移植语素的意义生成和演化的路径存在差异性,前人对此关注较少,尚未揭示出二者的差异。因此,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些探索。

一、从语言接触视角看方言词和外来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

众所周知,方言词和外来词是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语词汇成员多样性的重要保证。从语言接触视角来看,地域方

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后者对前者的语音、语义等方面都会有影响。其他语言中的外语词进入汉语,也会在语音形式和意义方面发生汉化。而作为方言词和外来词的构词成分——移用语素和移植语素在造词过程中其语义方面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伴随性的变化。这是随着地域方言词和外来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之后逐渐发生的。因此,有必要首先了解地域方言词和外来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

(一)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

汉语方言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其词汇与汉民族共同语接触过程中存在地域扩散的问题。最初,某个地域方言词在小的方言点或者方言片经常使用,后来使用地域扩散,以至扩大到整个方言区。如果这个方言区在经济或者文化方面比较占有优势,或者由于人口的较大流动,则会加速某些方言词扩散进入其他方言区甚至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从而扩大其使用范围。

从理论上讲,移用语素是随着地域方言词进入民族共同语中的,因此移用语素的数量相较于方言词来说要少得多。有鉴于此,考察地域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移

收稿日期:2020-12-08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今汉语语素义衍生方式对比研究”(2019B001)

作者简介:刘伟(1988—),男,山东潍坊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用语素义发展变化的认识。

地域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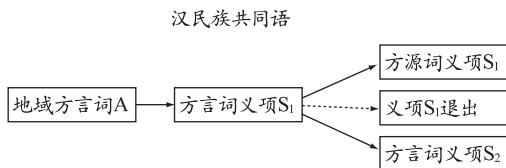


图1 地域方言词进入民族共同语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地域方言词A的某个义项 S_1 由于使用人数增加,使之不仅在本方言区使用,而且扩散至其他方言区,进而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但是仍然保留了较多的方言色彩。

第二个阶段:已经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方言义项 S_1 ,有三种发展趋势:第一种情况,因为使用频率逐渐上升,使用时间长,逐渐发展为方源词义项 S_1 ,此时其方言色彩已经褪去。第二种情况,在汉民族共同语中的使用频率下降,退出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系统。第三种情况,在移用了方言词A的某一个义项 S_1 之后,根据实际的语言交际需要,又引入了方言词A的第二个义项 S_2 。

总之,地域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是一个逐渐被同化与异化、吸收与排斥交织的过程,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在此过程中,作为单音节方言词的构词语素,其意义也会出现同步性的发展变化。

(二)外来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之后的汉化过程

一般来讲,外来词的移植主要遵循引进与汉化同步的原则。从源语言到目标语,外来词不仅在语音形式、构词模式,而且语义内涵方面都会经历汉化的过程。语音汉化主要是在音素的替换、音节的增删等方面的调整^[9]。构词模式的汉化主要是由造词理据不清的纯音译类单纯词调整为理据显豁的合成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原有的外来词整体降格为构词语素进行重新造词,如卡通(cartoon)——卡通人物、卡通片;一种是将外来词的意义整体附着于减缩后的某个音节上,从而语素化,再按照汉语的构词模式进行造词活动,如咖啡(cafe)——白咖、黑咖。还有一种是以上两种的混合,如啤(beer)——啤酒(音译加注表示义类的语素)——青啤、燕啤。当然,像卡通、咖啡等单纯词也可以直接使用。

外来词的汉化,从语义角度看有细微的汉化表现,主要分四个方面:

1. 音译成分的语素化,如“啤”“迪”“咖”“博”“模”等。

2. 在外来词某个义项基础上,增加所对应外语词中没有的义项,如“吧”“拜拜”等。

3. 进入汉语的外来词,将所对应外语词的某个意义移植进来,后来又根据实际需要,又移植了源语言中所对应外语词的另一个意义,例如“拷贝”“酷”“秀”等。

4. 移植进入汉语的某些外来词的意义有扩大、转移等现象,例如“沙发”“的士”等。

源语言中的某个外语词之所以进入汉语,主要是因为当代社会新事物、新观念不断涌现,但汉语中没有恰当的词汇形式进行指称,这时它会选择性地将其其他民族语言中表达这个概念的某个外语词移植进来,并加以适当地改造,从而保证交际的正常进行。

源语言中的外语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后,受到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规则的制约,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其中,外来词的语义汉化往往与语音结构、构词方式的汉化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外来词的语义汉化往往涉及到语言中的其他要素,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进入到汉民族共同语中的地域方言词和外来词,在意义发展过程中,也会影响到其构词成分——移用语素和移植语素的意义生成,有的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意义演化。下面将重点揭示二者在意义生成和演化上的具体表现,进而探讨其路径之间的差异。

二、从方言词的意义发展看移用语素义的生成与演化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中的方言词主要来源于哪些方言区呢?王艺霖对《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6版1488例方言词做过统计,发现方言词来源最多的前8个方言区中,北方方言区居首,其次是吴方言和粤方言,而且方言词在各个方言区的分布存在交叉情况。其中,数量占前五位的方言词来源地域如表1^[10]所示。

据统计,现代汉语中进入普通话的单音节方言词,从词性角度来分,名词有41个;动词有134个;形容词有40个;量词有8个;代词有8个;副

词有8个^①。其中,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最多。这些地域分布广泛的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当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扩大之后,有的也会出现意义的发展变化。例如:“靚、巴、侃、唠、瞎、掰、板、扁、蹭、板、寸、档、海、糗、哈、煲、仔、柴、嗲、宰、腻、奇”等。

表1 现代汉语中的方言词主要来源地域

来源方言区	数量	比例
北方	802	53.90
北方、吴	132	8.87%
吴	86	5.80%
粤	43	2.89%
北方、湘	38	2.55%

由于单音节方言词有时可以降格为语素参与造词,或者直接进入句法层面,因此移用语素的意义生成与演化跟方言词的意义是相伴相生的。下面,结合现代汉语方言词意义的发展变化对移用语素义的影响,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现代汉语中,随着单音节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构词成分——移用语素,其意义随着方言词^②的意义一起移用进来

“靚”是新时期由粤方言进入共同语的方言词,意义为“漂亮;好看”。随后用“靚”为构词语素构造出“靚仔、靚女、扮靚、靚丽”等复合词。此外,还可以独立做句法成分,如“你穿上这件衣服显得真靚”,从而扩大了“靚”的使用范围。

“仔”起初是香港社区词,后进入民族共同语,用来指男青年,以“仔”为构词语素可以构造“X+仔”等同族词,例如“狗仔、打工仔、狗仔队”等。也可以指小孩或少年,如“靚仔”“仔仔”(双生子)。

“侃”是北京方言词,具有“闲谈;闲聊”的意义,后进入汉民族共同语。新时期使用比较广泛,作为成词语素,可以独立成词出现在句子中,如“两人侃起来没完没了”;也可作为构词语素参与构造复合词,如“侃大山、侃爷”等。

(二)现代汉语中根据实际交际需要,在原有单音节方言词的某个意义基础上,又移用了——个或多个新的方言义

瞎 ④〈方〉农作物种子没有发芽出土或农作物子粒不饱满。(《现汉》第1版)

在《现汉》(第1版)义项④基础上,《现汉》(第4版)新增加两个义项:

⑤〈方〉糟蹋;损失;丢掉;白瞎了一个名额|一场冰雹瞎了多少庄稼。

⑥〈方〉没有头绪;乱;线绕瞎了。

“瞎”的“农作物种子没有发芽出土或农作物子粒不饱满”方言义,在中原官话中经常使用,改革开放之前就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了。这个意义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使用频率较高,使用范围得以扩大。后来又从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等方言区中移用了“糟蹋;损失;丢掉”义,这两个意义在中原官话中都存在,具有一定的派生关系。同时期又把同属于北京官话中的“没有头绪;乱”义一起移用进来,以补充汉民族共同语中没有的意义。这三个意义都可以作为词义来使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以满足不同阶层的交际需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也是其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当然,移用语素的意义也随着方言词一同进入共同语。

“档”在《现汉》(第3版)原生意义基础上,增加一个方言义:

⑤〈方〉货摊;摊档;鱼档|大排档。

(《现汉》第4版)

在《现汉》(第4版)方言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方言义:

⑦〈方〉量 档子:这不是档子儿

事。(《现汉》第6版)

“档”的“货摊;摊档”方言义是一个语素义,常作为构词语素构成复合词“大排档”“鱼档”,这个意义与大众的休闲饮食生活,特别是跟都市年轻一族息息相关。如“大排档”原来叫“大牌档”,源于二战之后的香港,指的是路边货摊,这个词使用频率很高,改革开放后进入大陆。时隔多年之后,又把东北官话中当量词讲的“档子”方言义移用进来(《现汉》第6版)。这两个意义一前一后地被引入,说明该移用语素随着方言词进入民族共同语,其特有的语义内容,丰富了汉民族共同语的表现力,也是这两个意义能够成功移用的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来源地域不同,“货摊;摊档”和量词“档子”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派生关

①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和2016版的义项对比发现,既有新移用语素义(含旧移用语素新增加意义),也有旧移用语素义的消失或者〈方〉标志的消失。本研究统计数据是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标〈方〉的义项得出来的。

②关于方言词来源地域的判定,借鉴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

系,跟“档”的原生意义(“带格子的架子或橱”“器物上起支撑作用的木条或细棍儿”)之间的语义关系似乎并不明显。《现汉》之所以将这两个义项处理为同一个词条,是着眼于词典编纂体例的考量。再如:

海〈方〉漫无目标地:海骂|她丢了个别针,海找。(《现汉》1973 试用本)

⑤〈方〉极言其多(后面一般跟‘了、啦’等):广场上的人可海了。(《现汉》第1版)

⑦〈方〉毫无节制地:海吃海喝。(《现汉》第4版)

“海”的这几个方言义不是同时而是分阶段逐渐移用。由于词典的收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可以推测第一个方言义“漫无目标地”很可能在新中国建国前后就已经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了。据考察,这个意义是从晋语中移用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中的。而第二个移用了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和晋语中的方言义“极言其多”(《现汉》第1版),这个意义是新时期之后活跃在汉民族共同语中的,至今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第三个方言义“毫无节制地”是新时期较近的一段时间从北京官话、晋语和西南官话移用进入的。这三个方言义在晋语中都有,后两个方言义在北京官话中都存在,它们分三个不同时间段逐渐移用,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派生关系,反映了现代汉语在移用方言义方面的阶段性特点。

一般来说,作为单音节方言词的构词成分——移用语素的意义往往是随着方言词意义的移用。最初方言词的某个意义移用进入共同语,如果这个意义能够在民族共同语中得以推广,获得语言共同体的认可,汉语共同体才会将这个方言词的其他意义移用进来;或者从其他地域方言中选择与之同形且意义上有联系的其他意义移用进来,相应的移用语素的意义也就进入共同语,或者参与构词,或者进入句法层面。

(三)现代汉语中,方言词的某个意义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退出了汉民族共同语。

肯²③〈方〉表示时常或易于:这几天肯下雨。(《现汉》第2版)

噌²〈方〉叱责。(《现汉》第2版)

肯²和噌²的意义在第5版中同时被删除,说明在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之后,由于使用范围过小,

使用频率较低,因此从汉民族共同语中退出,而在其地域方言中继续使用。

(四)现代汉语中,方言词的某个意义的方言色彩已经逐渐淡化

部〈方〉量词,用于机器或车辆:一部机器|两部汽车。(《现汉》第2版)

渍〈方〉积在物体上面难以除去的油泥等:油渍|茶渍。(《现汉》第2版)

逗〈方〉逗笑儿:这话真逗儿|她是一个爱说爱逗儿的姑娘。(《现汉》第2版)

“部”的这个当量词讲的意义在《现汉》第4版中已将〈方〉去掉;“渍”“逗”则是在《现汉》第4版中还保留〈方〉,但是在《现汉》第5版中已经被去掉。这说明这三个移用语素的方言色彩淡去的时期正是世纪之交。

作为方言词,其方言色彩在不同版本的比较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方〉的消失,这也意味着移用语素随着地域方言词进入民族共同语的过程是分阶段发展的,由越出原方言区,扩大了使用区域,逐渐被汉语共同体所接纳,褪去方言色彩,从而真正成为汉民族共同语语素系统中的一员。在方言词演化成为方源词时,移用语素的方言色彩也相应地褪去,褪去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构词量的多少、使用范围的广狭、使用频率的高低。

在地域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接触过程中,移用语素随着方言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中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方言词意义的发展变化对移用语素意义的影响。

三、从外来词的意义发展看移植语素义的生成与演化

据统计,《现汉》(第7版)中的外来词共收463个。这些外来词语素化的途径各不相同。孙道功认为,“音译外来词语素化模式包括词汇降格和音节升格两种类型。……单音节词仅能选择词汇降格语素化方式,多音节词可以选择词汇降格和音节升格两种方式”^[8]。这里所提出的词汇降格就是原来的单音节或多音节音译外来词整体降格为语素重新参与造词,而音节升格就是外来词的某个音译成分升格为语素。

其中,普通单音节外来词(与专有外来词相对)在现代汉语中相对较少,而多音节外来词数量是最多的,其中音译成分的语素化变化最明显,

这两类都符合汉民族一个音节对应一个字(或者语素)的传统认知模式,也是最为典型的。对此,苏新春通过对16部汉语新词语词典统计后发现用于记录外来词的汉字共有186个,其中已经语素化的单音节语素共10个,分别是“啤、波、咖、吧、秀、奥、摩、的、迪、巴”^[3]。刘晓梅经过研究,

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4个,分别是“模、派、艾、唛”^[4]。李志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共有32个^[5]。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还可以增加“诺(Nobel)、拜(bye)、托(TOEFL)”。因此,一共35个^①。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新罗列,如表2所示:

表2 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移植语素

类型	单音节移植语素							
纯音译类	的(taxi)	托(TOEFL)	咖(coffee)	奥(Olympic)	趴(party)			
	粉(fans)	博(blog)	麦(microphone)	诺(Nobel)	嗨(high)			
	咖(cast)	波(ball)	派(pie)	巴(bus)				
	胎(tyre)	迪(disco)	拷(copy)	唛(mark)				
音译兼意译	模(model)	酷(cool)	秀(show)	拜(bye)	客(hacker)			
	泊(park)	破(poor)	控(コン)	晒(share)				
音译加注汉语语素类	啤(beer)	卡(car)	吧(bar)	卡(card)	挞(tart)	艾(AIDS)	乒(ping-pong)	芭(ballet)

上述单音节移植语素的实现,主要是由于作为构词成分参与构造的新词数量比较多(少部分像“秀”“嗨”“酷”“晒”这种单音节外来词可以直接对应一个语素),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构词能力的语素,反映了由其构造的外来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之后,它们汉化的程度比较高。通过考察多音节外来词的语素化(不含多音节外来词整体降格为语素)这一现象,我们发现,随着多音节外来词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移植语素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语义汉化。一方面在进行反复造词的过程中,多音节外来词的音译成分也获得了语素的身份,从而将外来词的部分义项或者全部义项转移到移植语素上。另一种情况就是在原有意义基础上,通过扩大、缩小、转移等演变方式生成新的语素意义。但不论哪一种情况,这一过程都是伴随外语词与汉民族共同语、地域方言的接触而产生的汉化问题。下面主要从语义方面考察现代汉语中多音节外来词的语素化及其意义的生成与演化。

模(特)、(黑)客”等比较典型。这些移植语素都经过多音节外来词减缩造词才获得语素的身份。

需要注意的是,多音节外来词和其某个音译成分处于不同层级:一个是语法层,一个是音系层。在汉化过程中,处于音系层的某个音译成分逐渐取得处于语法层的外来词的整体意义,这属于意义的跨层移植。例如“巴士”(来源于“bus”的音译)中的音译成分“巴”在类推减缩造词(“大巴、中巴、小巴”)等中具有了“巴士”的意义,升格成为语素。这与汉语本土词的减缩导致语素义的生成不同,如“人民警察”“交通警察”减缩为“民警”“交警”,“警”在现代汉语类推减缩造词中生成了“警察”义,其中“警”本身就是语素,不是由音节升格为语素,因而不属于意义的跨层移植。主要有两小类:

(一)多音节外来词的某个音译成分汉化为移植语素,其生成的意义则为外来词的意义

1. 将多音节外来词减缩为某个代表性音节,并用它不断参与类推造词,最终独立为一个新语素,例如“巴、奥、博、咖、迪”等。这一类相对比较

这一类汉化之后,往往是外来词中的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音节获得了语素身份,同时将外来词的某个意义整体移植进入语素之中。新时期的移植语素多数是单义的。例如:“啤(酒)、巴(士)、奥(林匹克)、博(客)、咖(啡)、迪(斯科)、

“咖啡”属于单纯音译词,经过减缩,以“咖”为整个外来词的代表。按照“X+咖”的模式类推造词,产生了“清咖、黑咖、白咖、热咖、冷咖”等以“咖”为核心语素的一系列复合词,从而真正获得了语素的身份,具备了“咖啡”的语素义。

“奥林匹克、博客、迪斯科、巴士”等其他外来词中的代表音节(“奥”“博”“迪”“巴”)实现为语

①汉语中的单音节普通移植语素(字母式语素不计)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依靠减缩类推造词将音译词中的构词成分语素化,二是单音节外来词对应的单音节语素,三是来自日语的汉字式借形词中的构词成分,如“萌(萌之)”“屋”(装饰考究、较小的营业场所,如理发店叫床屋)。此处不讨论第三小类,特此说明。

素的方式也是通过批量造词实现的。如以移植语素“奥”参与构词形成的词,如“申奥、奥委会、奥运村”等;以移植语素“博”为构词语素形成的词,如“微博、博友、开博”等;以移植语素“迪”构成的新词,如“迪厅、蹦迪”等。在这个过程中,语素义将外来词的词义原封不动地移植进来,但没有生成新的意义。这一时期,虽然经过了音译成分的语素化,但是其外来色彩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多音节外来词汉化之后减缩为某一个代表性的音译成分,在类推造词的过程中,取得了语素义,但这个意义与本土的原生语素具有意义上的联系^[7]。因此,汉族人往往对其外来身份不易体察。例如:“模、客”。

“模特_儿”来源于法文单词“modèle”的音译,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之后,选取其中的一个音节“模”作为“模特儿”的代表从而参与构词,如“男模、女模、嫩模、车模、名模”等,从而实现了语素化。这个意义与原生语素“模”的“法式;规范;标准”义联系密切^[6]。

“黑客”,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指精通计算机技术,善于从互联网中发现漏洞并提出改进措施的人”;一个意义是“通过互联网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查看、更改、窃取保密数据或干扰计算机程序的人”。《现汉》第7版认为,这两个义项来源于英语“hacker”的音译。“黑客”进入现代汉语后,受“X+客”构词模式的影响,产生了像“红客、蓝客、威客”等词,这里的“客”指的是“从事某种活动的组织、机构或人”与汉语本土原生语素“客”的“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称呼”意义联系密切。

(二)外来词进入汉语后,将源语言中的某个意义移植进来,后来又移植了该词在源语言中所对应外语词的其他意义,有的在某一个意义上音译成分实现了语素化

“拷贝”来源于英语单词“copy”,指“拍摄成的电影底片洗印出来的供放映的胶片”(《现汉》第2版)。但是后来又陆续移植了两个其他义项:一个是动词性的“复制(音像制品、计算机文件等)”义;一个是名词性的“复制出的音像制品和计算机文件等”义。其中动词性的义项,在“拷一份、拷过来、拷一下”中经常使用,音译成分“拷”已经实现了语素化。

(三)外来词的音译成分语素化后,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意义发生进一步演化,出现了扩大、

转移等变化

“的士”来源于英语“taxi”,经粤方言音译而成,用来指称出租车,但是进入汉民族共同语之后,按照“X+的”的构词模式,产生了“的哥、的姐”,或者“叫一个的、打一个的”等用法,使用频率很高,因此“的”实现了语素化。之后,“摩的(运营用的摩托车)、轿的(运营用的小轿车)、板儿的(运营用的平板车)”等也出现了,此时使用范围已经扩大,不再单纯指出租车,而是泛指出租用的交通运输工具。

“卡车”在国内指的是运输货物、器材等的载重汽车,如“大卡”“小卡”“重卡”。其中,《现汉》(第7版)认为,“卡”是对“car”的音译,但英语中“car”有三个意义:一个是小汽车;一个是火车车厢,一个是(有特殊用途的)火车车厢。实质上,“car”多指的是乘坐人的小汽车或轿车,而非载重汽车。在美式英语中,卡车或货车用“truck”,而在英式英语中,则用“lorry”。所以,“car”经过音译移植进入汉语之后,所指与源语言并不相同,应该属于意义的转移。

(四)外来词最初的某个音译成分实现为语素后,在移植语素的一个意义基础上,在目标语中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演化出新的意义

“吧”来自于英语单词“bar”,在英语中仅指酒吧。最初进入汉语之后,汉语采用音译加表义类语素的方式造出“酒吧”一词,用来指称“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供人饮用的地方,也有专门开设的”。在此基础上,将“酒吧”减缩为“吧”(现代汉语中不单说),进一步参与造词,例如“吧姐、吧女、吧台”,因此“吧”最终实现了语素化。这是汉化的第一个阶段。后来,“吧”的所指范围扩大,受“酒吧”的“X+吧”构词模式的影响,产生了“书吧、陶吧、水吧、泡吧”等,此时“吧”已经不再专指酒吧,而是泛化为某些消费活动场所。这是语素“吧”意义的第二次汉化阶段。总体来说,这一类相对比较少。

我们认为多音节外来词语素化之后的意义生成与演化,从最初的某个音译成分跨层移植了整个外来词的意义,到原有意义出现扩大、转移,再到新意义的增加,实际上是汉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是汉语词汇语义系统自我调整与语言群体交际表达需要综合作用的产物。

现代汉语中,地域方言词和外来词在进入汉

民族共同语过程中,它们的意义发展变化的过程多样。作为构词成分,单音节移用语素和移植语素的意义生成和演化的路径各不相同。前者随着单音节方言词的意义移用,依靠词汇降格直接生成;其意义的演化(由A义到B义)主要在句法层面实现。其不同意义有的来源于同一个方言区,具有较为明显的派生关系;有的来源则并不完全出自同一处,因此它们意义之间并不具有明显的派生关系。移植语素义的生成,少部分是单音节音译外来词依靠词汇降格直接实现,大部分需要通过多音节外来词音译成分的语素化,其最初的意义是某个音译成分跨层移植了外来词的意义,从而在造词活动中生成的;其意义的演化有的在词法层面实现,有的则在句法层面实现,但演化过程中(如义项数量增加或意义扩大、转移等)则可能受到汉语词汇语义系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意义之间具有派生关系。但是来源不同的同形移植语素,其意义之间则不具有派生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从辞书编纂角度来看,词条(或字头)的分合处理不能仅仅坚持词汇学原则,有时还要兼顾词典学原则^[11]。研究中发现,从词汇学原则来看,意义来源于不同方言区的同音同形方言词(或语素)本属于不同的方言系统,理应处理为不同词条(或字头),但从意义标准出发,如果这些方言意义之间存在联系,学者们一般也会将其视为多义词;有时这些意义之间的联系并不显豁,但辞书编纂者仍将其汇聚到同一个词条(或字头)之下,这可能是出于词典编纂中的经济原则(尽可能少占文本空间)或者编纂体例的考虑。对于来源不同且同音同形的外来词(或移植语素),或者是同音同形的本土词(或原生语素)与外来词(或移植语素),由于意义之间不具有派生关系,辞书编纂者一般不会将其视为同一个词条(字头),这符合词汇学原则;但

如果将其置于同一个词条(或字头)之下,这估计是基于词典编纂中的经济原则。《现汉》对于以上两者的不同处理体现了内外有别的理念,但从词典编纂中的经济原则或者编纂体例出发处理义项的分合,我们无可指摘,关键是要做到前后编纂原则和体例一致。因此,从词汇学原则出发,单音节移用语素和移植语素(也可以进一步说方言词与外来词)的意义演化研究都应该剔除意义来源不同且不具有派生关系的这种类型。

参考文献:

- [1] 苏金智. 语言接触中语言演变的连续体模式[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 [2] 孙银新. 现代汉语词素研究[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 [3] 苏新春. 现代汉语外来单音语素的形成与提取[J]. 中国语文, 2003(6).
- [4] 刘晓梅. 当代新词语对汉语语素系统的影响[J]. 暨南学报, 2005(1).
- [5] 李志佳. 音译类单音节外来语素研究[D]. 延吉: 延边大学, 2012.
- [6] 刘伟. 从词素来源看现代汉语词素同一性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音形相同字头为例[J]. 辞书研究, 2017(3).
- [7] 刘伟. 当代汉语同素词族的衍生与语素义的发展变化——兼谈新语素义的入典标准问题[J]. 辞书研究, 2019(6).
- [8] 孙道功. 音译外来词的语素化及词义生成模式研究[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9(2).
- [9] 冯海霞. 外来词的汉化[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 [10] 王艺霖.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方言词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 [11] 张博. 《现代汉语词典》条目义项与词语义位的不对应及其弥合空间[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Meaning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ransferred Morphemes and Transplanted Morphemes of Modern Chinese: And also Discuss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LIU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Monosyllabic transferred morphemes emerge with the meaning transference of dialect words and are directly generated depending on word degradation, and the meaning evolution (from meaning A to meaning B) is mainly realized at the syntactic level. According to the regions of meaning sources, there appear derivation and non-derivation relations among the meanings. The meaning generation of monosyllabic transplanted morphemes is realized by monosyllables of loanword transliteration depending on word degradation (occupying a smaller portion), or mostly by the original meaning emerging with a transliteration element transplanting the loanword meaning on the cross-level and the word-making activity by the morphemization of polysyllables of loanword transliteration compositions. The meaning evolution is realized at the lexical level or syntactic level, and there appear derivation relations among the meanings. Chinese dictionarie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in treating the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of entries. Therefore, the types with different meaning sources and no derivation relations should be eliminated in the study on the meaning evolution of monosyllabic transferred morphemes and transplanted ones.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dialect word; loanword; morpheme meaning; generation; evolution
(责任编辑 梅 孜)

版权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本刊作如下声明:

1.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意味着将作品的发表权、删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汇编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制品形式(包括光盘、互联网出版物)出版发行权等权利授予本刊,并视同许可本刊官方新媒体免费转载以及与有关数据库的合作(本刊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如不同意以上授权,请在投稿时说明。

2. 本刊载刊的全部编辑内容归《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摘编、刊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在本刊发表的文章等。如有违反,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3. 本刊版面、栏目等受著作权法保护,对复制、仿制、假冒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4. 已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有免费结集出版精华本、合订本,以及相关电子产品的权利,有特别声明者除外。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